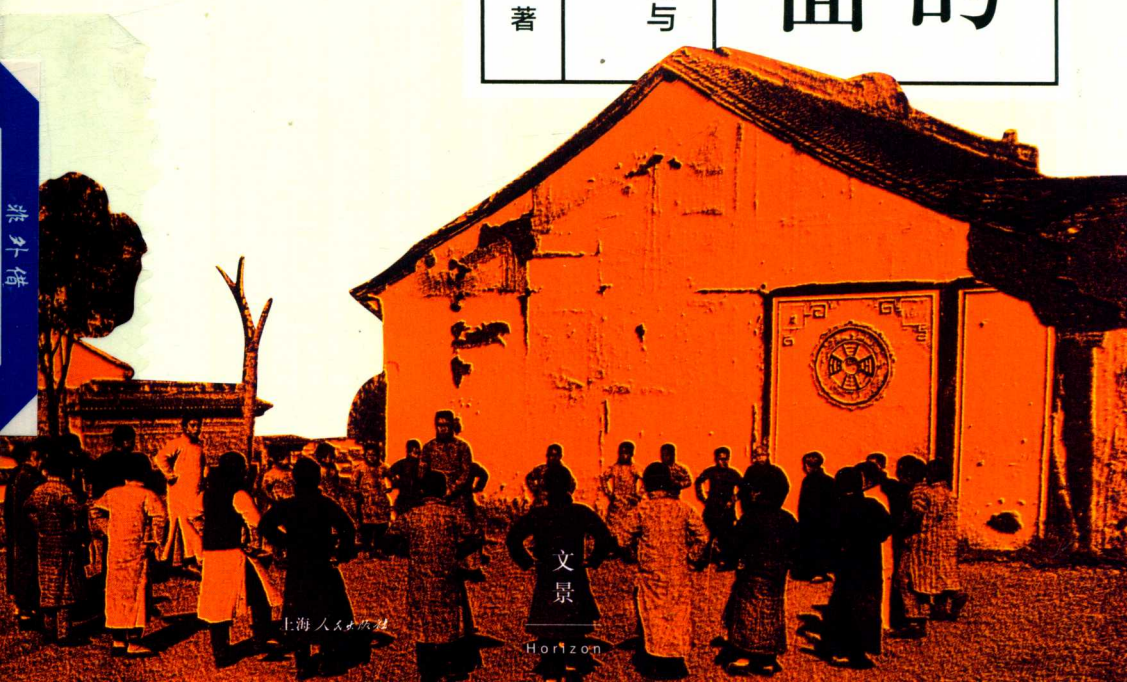


五四的 另一面

『社会』观念的形成与
新型组织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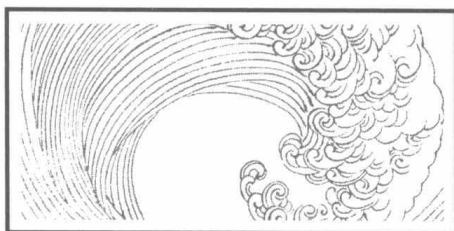
杨念群 著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五四的 另一面

『社会』观念的形成与
新型组织的诞生

杨念群 著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

杨念群 著

出品人：姚映然

策划编辑：章颖莹

责任编辑：章颖莹

营销编辑：雷静宜

封面设计：梁依宁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9 字数：180,000 插页：2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80元

ISBN：978-7-208-15646-3 / K·28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
诞生/杨念群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646-3

I. ①五… II. ①杨… III. ①五四运动—研究 IV.
①K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9416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自序.....1

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3

引言.....3

对自由主义“五四解释学”的批评.....7

修正途径：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16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22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30

第二章 五四前奏：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36

“文化普遍主义”如何收缩为局部的政治建设问题.....37

“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42

“文化”作为一场新兴运动是如何出现的.....47

东西文化之争如何演变成了“归约主义”的游戏.....57

第三章 “无政府”构想：“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

的媒介.....71

对“国家”偶像化的批判和质疑.....72

“社会”观念的引入与新型“自治”组织的建立.....85

以基层“社会革命”替代上层“政治革命”.....116

第四章	“个人主义”兴衰史：“个体”是如何消融于“社会”之中的.....136
	五四前后极端“个人主义”论述的短暂流行.....141
	“群己”界线的重设.....150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与抵牾.....162
	人生际遇与“个人主义”：以文学艺术界的争论为例.....170
	“社会有机体论”：“集团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取代.....181
	对“个人主义”日常生活方式的批判.....192
第五章	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205
	身份认同的难局.....205
	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218
	地方自治的含义.....227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235
	地方性责任伦理与社会组织的建构.....244
	结论.....257
	主要参考文献.....267
	后记.....276

自序

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5月4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几句“五四万岁”的客套话，却要打着“学术”旗号来赶集就有很大难处，难在这集市须是以新鲜产品示人，如不识趣，一脚踏入其中，就如赶科举考场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来。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识，就该拿出个有资格赶此大集的理由来。详细的表白都在后面的行文中，读者自会品评，不用我在此啰唆。不过，既然赶集的人历来如过江之鲫，近年名门正派和各路草野神仙均喜混迹其中，还是得先辨明自己是哪一路的鬼怪才好。否则刚踏入门就被乱棍打出，不但失了身份还丢了资格。逡巡良久，才在下面简要列出些以往五四研究的八股信息和我的批评态度，交由读者来评判我赶五四这趟集是否合理。

八股一：五四被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个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4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一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

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文革”中神像被砸，老师被打也是五四惹的祸。

我的回答是：历史研究如果也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套“唯成分论”“血统论”，岂不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八股三：批五四居然成了兴国学的理由，遗老遗少纷纷借攻五四出气，以批鲁迅为时髦，遍地以“返祖现象”为荣，奇观妙境一时无两。

我的回答是：堕落到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

八股四：五四“个人解放”的尝试，如果“个人”得不到自由，就说明五四完全失败，毫无意义。

我的回答是：“个人主义”是西方舶来品，不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的东西；我并非反对自由主义，但仍以为，“个人”自由学得像确是五四的目标之一，但绝非五四的唯一价值所在。

八股五：五四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是学术积累的大成，却与政治无关。

我的回答是：这是故意躲避意识形态解释的借口，情有可原却于理不合，偏离了历史的本相。学术文艺乃是五四的一面，五四的另一面是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其得失成败虽见仁见智，却难以回避。

以上是我今年五四赶集的联络图，凡欲知我罪我者，请凭此图。

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引 言

多年来，史学界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不过祭台上下想移情换景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大概是已难忍祭典演出的仪规陈旧乏味，拜辞俗腔滥调，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不是这两位“先生”不好，而是演员的演技太差、出场频率过高，反而会倒了观赏者的胃口。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还有位大明星叫“莫小姐”（道德伦理革命），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当年的祭拜风情蕴出些新意而不至于陈腔依旧。¹

1 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在该书中译本附录中，林毓生指出：五四“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虽然自五四以来这些“目标受到了不少左右政治势力的分化与压迫，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内在思想混乱的干扰；但，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五四对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要求是中国人民一致的愿望”。在这套论述中，“自由”被推举到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参见同书，第336—337页。

“五四解释学”自进入知识生产流程以来，就一贯难脱政治史解读的窠臼，经典的国史叙事习惯把五四看作一场相对单纯的爱国抗议事件；五四犹如薪柴燃料，点燃了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熊熊火焰，它漫天辉映着，遥遥与作为近代史之开端性标志的鸦片战争相呼应，五四的作用就是把自己变成中国近代史叙述末端的一个句号。¹自“莫小姐”登场并日益走红以来，大多数的五四研究才开始转向，试图把它解释成一场触及中国人灵魂和精神变化的“文化改造运动”，对这场运动的一个最佳描述就是“人的觉醒”。周策纵先生那部五四研究的名著，其英文书名就直截了当地说五四是“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意思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思想革命。²既然是“思想革命”，就不是短暂的政治运动影响力能够说明的，而是具有一种持久的精神召唤力量。当年胡适也特别强调五四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强调那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在这一点上胡适与孙中山的看法比较接近，孙中山对新思想运动的评价高于其他活动。故胡适也特别注重新文学运动，甚至称五四是中国发生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大意也是如此。³

1 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前言：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中，彭明指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大转变时期的标帜。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揭开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成为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参见同书，第2页。

2 参见〔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3 周策纵就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观点是把五四运动看作一场学生的爱国运动，强调其文化而不是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意义。他和一些持相同观点的人所写的英文著作，使许多西方人把这场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第3—4页。

不难发现，这种解读自觉不自觉地在大唱“纪念史学”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调，显示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特别能展示出台湾学者所崇尚的一种史学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和大陆研究语境的明显不同。大陆的五四研究，除“赛先生”一直大受热捧外，“德先生”和“莫小姐”每回上台虽粉妆依旧，台下却仍觉雾里看花，模样含糊，甚至有人直指“莫小姐”在民族自救的乱世狼烟中惊骇得花容失色，早已多年未见登台；“赛先生”则被持续追捧，终获升格为治国要策。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忽然发现，没了“德先生”和“莫小姐”的帮衬助演，“五四解释学”就如双翼或三翼折掉了一只或两只，成了瘸子。因为过度提倡“科学”以致到了崇拜至极的程度往往都是以反传统为代价的，“科学”救国的口号人人能喊，可无论精英还是大众，对人文的悟解和感受能力却在普遍退化，又何谈人的觉醒？

恰在此时，台湾五四研究的观点被高速引进大陆史学界。台湾史学界秉持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传统，即把个人的觉醒看作五四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想以此消解五四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是维护还是否定五四个人主义的觉醒应该成为评价其研究价值的最重要依据。这个解释思路对于那些刚从极左意识形态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大陆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时间“自由”的旗帜到处猎猎飘扬，其凯歌行进之势，大有并吞思想八荒的势头。

不应否认，个人主义的觉醒确实是五四时期知识精英所阐扬的最重要的思想主题。但我以为，不可忽视的是，五四以后掀起

的“社会改造”运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而且其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要远过于对个体“自由”观念的认同和诠释。从研究价值上而言，两者至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但大陆史学界却基本不假反思地直接承传了自由主义的解释方法，个人觉醒程度不但几乎被推许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而且是推进还是干扰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越来越成为衡量五四以后历史变迁之得失的标准。甚至有人更为极端地认为，民族主义式的救亡理念和“社会改造”运动压抑了个人解放的顺利实现，并最终导致五四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这种把“个人觉醒”与“社会改造”运动对立起来的做法，基本上搬用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原则，却未必适用于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解释。因为五四以后，“社会改造”运动不但成了历史的主调，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各种变革理念也深刻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日益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并非只构成了“觉醒”和“压抑”的简单对应关系。

在近30年的“自由主义”叙说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期间流行的“反传统”思想造成的文化真空导致五四自身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危机，由此酿出的悲剧情绪已逐渐盖过了倡扬五四为现代革命起源的浪漫狂喜，甚至五四精神还须为“文革”灾难负起沉重的历史责任。于是，否定五四的批判精神又渐成当代的时尚话题，捍守“国学”的新“冬烘”们仿佛从冬眠中苏醒，趁机重施雅黛粉墨登台，大扮起了遗老遗少。至此，由“五四解释学”构筑起的瑰丽圣殿顷刻出现了崩裂瓦解的态势。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对自由主义“五四解释学”的批评

说到五四的整体叙事格局，我在前文已简单勾勒出了一个轮廓。这一画面显示出，百年来史学界构筑“五四解释学”，除少数讲法一如既往地飘扬乐观的高调外，大多已流露出悲观抑郁的腔调。起因无非是说五四的反传统反过了头，造成了“自由主义”前途的黯淡与“科学主义”猖獗的谬误，于是“五四解释学”的旋律充满了忧郁感伤，音调悲怆地反复谴责假借现代话语暴力群殴传统，造成权威流失的惨象；或者慨叹个人自由之身殒丧于挽救危亡的圣战之途，分别把五四的悲剧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缘的伤害。既然悲情调子已定，那么大家尽可删繁就简、各取所需地吹拉弹唱，不过主调大多是探寻人性觉醒努力的失败。

内因论影响最巨者甚至提炼出了一个异常简化的公式，这公式大体是说，“五四知识精英”之所以激烈地全盘反传统，是因为骨子里有一种“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遗传。古代的文人习惯先处理文化问题，然后再考虑政治制度的建构，或者用处理文化的方式应对政治社会问题，这样的方法在过去有效，但拿到近代就完全失灵。结果，五四青年用传统反传统，就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¹据说“思想优先”的处事办法由孟子发明，一直流传到五四。这公式虽简化得让人起疑，却精明地概括了半部中国思想史。何出此言？

宋代以后，是理学发威的时代，士大夫一度形成与皇帝共治天

1 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

下的表象，靠的就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与皇帝沟通。也就是说，直到宋代以后，那些旧的知识精英宣称自己得了秘法心传，可以讲一套道德教化的道理去“正君心”，皇帝也相信自己道德修养的高低会影响政治制度的运转，与是否坐稳江山大有关联。这样，那些士人就开始有了密集出入宫廷的机会，他们由此自信满满地认为不但可以教育小孩，还可以教育皇帝。但这并不是说孟子时代的王者就已经那么容易说服，宋代以前的皇帝基本不相信教化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更相信“天”的旨意，比如地震和灾祸的示警作用，按照学术界的说法是受“天谴论”的支配。大体上，可以说孟子的“道德主义”到宋代才被重新发现和有效地加以使用。¹

至于宋以前，士人是否用“思想优先于政治”的看法去解决问题就很难加以证明了。这种道德教化优先的方法不能说在近代中国没有表现，比如康有为策动晚清的变革运动，在处理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时，采取的仍是用道德完善催化制度变革的办法。他以为只要光绪帝一个人的道德修为够高，就自然会泛化推及政治制度的变革，甚至无视光绪帝是个无权无势的傀儡这一明显事实。在今天看来，康氏似乎傻得可笑，可是如果将之放在“道德优先”的历史传承脉络里，就能理解其行为的正当性。不过，若借此例子就断定近代的知识人都如康氏这般天真可爱，却大可怀疑。

应该承认，这种把五四思想概括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论述是颇具吸引力的，尤其是其叙述风格兼具哲学论辩的形式美和音

1 关于从“天谴论”向“道德论”转变的历史状况，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7页。

乐韵律的节奏感，亦不乏相当的历史证据做支持。但我脑子里至少有两点疑问：

第一，以“道德教化律”连续涵盖整个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的思维是否有效？这样做的风险是首先必须承认儒学“普遍化”到可以时时不间断地发生效用。但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某些原则，如“道德教化律”可能只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之内才是有效的，换个时期就难说了。特别是西方高度“入侵”后，“道德优先”的原则是否可以作为影响士人的绝对思维条件就更加可疑。

第二，儒学即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支配着身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知识精英，也令人怀疑。与此相关，儒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皇帝的行为施加影响也要打个问号。有一种说法是，儒生不间断地把道德修身的教条灌输给皇帝，他们强调用个体的道德意志控制局面，并相信其具有超绝的力量，故而导致皇帝道德负担过重，以至于无法应对整个帝国日趋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问题，最终在西方入侵之下难逃失败的命运。¹这种推断把古代中国的衰落归结为“道德主义”的无孔不入，似有夸大文化思想作用的嫌疑。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儒学一旦转换了生存的场所，就很容易变得面目全非，难以用普遍整体的观念加以把握。

我们观察五四时，往往是把它当作传统的终结者加以认识的，这个终端之前的历史虽然如一根线索般地一直蔓延下来，不曾中

1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一直强调道德意志所发挥的决定性力量导致明朝的体制运转缺乏活力。这个观点对西方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持相似观点者又可参见[美]狄百瑞：《儒家的困境》，黄水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断，然而在西人看来却如腐朽自闭的密棺。他们发现，中国人的历史观就是一套自我密闭的循环论，中国起源期的历史好像永远被认为是最好的时期，越往后越糟糕。按古人的说法，“三代”是黄金时期，以后的历史都是在模仿“三代”。因为总是学不像，自然是越往后看越悲观。所以西方才有理由说中国历史总是停滞的，必须受外力冲击到一定力度，才能逼使它从循环变成进化。其实把中国历史观完全理解为“循环论”是一个误解，中国士人把目光指向“三代”常常是一种叙述策略，或者大多仅是一种表态，他们更多是在改造和挪用远古的资源。比如宋代士人就是打着孟子的旗号把“道德教化”变成控制权威的手段，这其实是对孟子思想的变形挪用，最后在实际参与政治方面却比孟子更加成功。从宋代的情况看，士人和政治权威的关系比孔孟和王者的关系还要紧密，尽管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如果观察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就会发现，士人并不完全是僵死地恪守前代信条，或真以为前代一定胜过后代，也许情况恰恰相反。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后来的儒者经常“解构”或重新组装儒学的理论零件，即使表面上模仿袭用，到最后也很可能脱形走样，甚至搞得面目全非。至于在改造挪用的状态下是否还始终遵循着一种统一的思想原则，比如“道德优先”的教条，我以为一定要在不同的历史境况下加以验证，而非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抽象地加以认定。所以，说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袭用的还是孟子那套观念，恐怕没有多少说服力。

另外，一个历史常识是儒学到宋代以后就越来越碎片化了。碎片化的理由太复杂，我在此不想多说，我只想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宋代以后，经济和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儒学的中心地位也随之被分